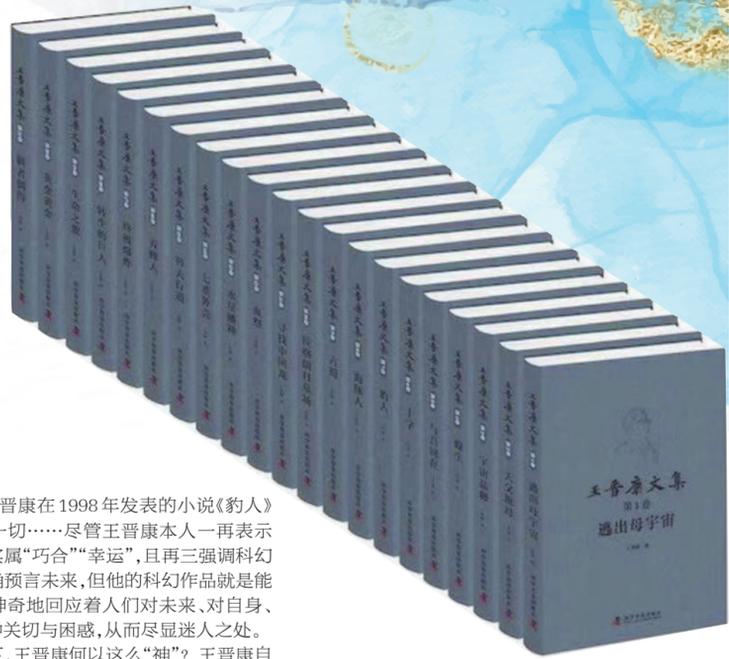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新作聚焦

《王晋康文集》： 科学与人文的盛宴

□ 乔世华

王晋康的科幻小说提醒我们，科学因子在小说审美价值评估中一直就不该缺席。进而言之，包括王晋康在内的众多科幻作家的创作事实上已经在刷新我们对“小说”、“对文学”的认知与期待了。



皇皇21卷、总计740余万言的《王晋康文集》由科学普及出版社推出，这套文集悉数收入王晋康迄今为止几乎全部创作及访谈，于科幻文学的爱好者们来说，实在是一大福音。透过它，既可领略一位富有光彩和影响力的中国科幻文学界领军人物的蝶变，还可观察中国新生代科幻文学30年间的风起云涌，亦可见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大趋势。

用“大器晚成”来形容王晋康可谓恰如其分。1993年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上发表处女作《亚当回归》时，他已经45岁了，这并不是一个讨文艺女神喜欢的年龄。那时，有谁会相信这样一个“半路出家”的中年业余作者会在日后爆发出如此强大而持久的创造力，接连三地铸造文学的辉煌？在迄今为止30年的科幻文学创作生涯中，王晋康为读者呈献了《蚁生》《与吾同在》《时间之河》《逃出母宇宙》等110余部（篇）小说、剧本和随笔（其中有20多部长篇小说），获得约50个文学奖项，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、日、韩、德、意等多国文字，有多部作品影视版权售出。而且，在这期间，王晋康的那些“神预言”一再为人们津津乐道：2005年，美国思想家兼预言家雷·库兹韦尔出版了造成轰动效应的著作《奇点临近》，提出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，而王晋康1997年在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上的发言《克隆技术和人类未来》即已预言了“人类的革命性的异化”，亦即后人类的诞生；2010年，美国电影《盗梦空间》里“梦中梦”的构思，让许多读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晋康1997年发表的小说《七重外壳》；2016年，谷歌围棋人工智能“阿尔法狗”以4比1的成绩战胜世界围棋冠军，而王晋康在1995年发表的剧本《生命之歌》中，已正面描述过称雄棋坛40年的人类棋手败给电脑后的沉重失落；2021年，中国百米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上闯进

男子百米决赛，王晋康在1998年发表的小说《豹人》中早就预言了这一切……尽管王晋康本人一再表示自己的先知先觉实属“巧合”“幸运”，且再三强调科幻文学并不负责准确预言未来，但他的科幻作品就是能这样一再积极而神奇地回应着人们对未来、对自身、对终极问题的种种关切与困惑，从而尽显迷人之处。

不妨问一下，王晋康何以这么“神”？王晋康自己说过：他是一个科学原教旨主义者。他早就感受到了科学本身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并矢志不渝地信仰科学，可惜蹉跎岁月、阴差阳错，令他这位理工科“学霸”的理论物理学家梦想折戟沉沙；但命运又是公正的，他得以在文学场域中发挥所长，得心应手地践行着自己的“核心科幻”理念，尽情表现和释放其敏锐的科学判断力和丰富的科学想象力，展示充沛的科学知识储备、表达清晰的工程师思维，并形象而精准地为我们描绘未来人类社会、科技进步的种种可能图景：克隆技术让母系社会重新降临（《2127年的母系社会》），群体无意识可发展出种群智慧（《沙漠蚯蚓》），高度仿真的虚拟现实技术让人真假难辨（《七重外壳》），二阶真空的科学设定为人类“逃出母宇宙”获得新生提供了理论支撑（《逃出母宇宙》），生命的真谛是信息（《宇宙卵》）……捧读王晋康作品，不仅仅是赴缪斯的神圣之约或欣赏文学盛宴，同时也意味着踏上了有意义的、有内容的科学发现之旅，切实有力地体会科学学的魅力和伟力、见识宇宙世界的壮丽和深邃，开眼界，长知识，获教益，得智慧。

文学界向来习惯于将科幻文学定位为通俗文学，王晋康本人也是如此，而且预见科幻文学“永远不会成为文学的主流，但永远不会消亡”。这当然都很有

道理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：小说当初就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议，否则就不会有“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纵读诗书也枉然”的说法。科幻文学必须“俗”，要不然那包含在其中的科学知识如何才能让读者吸收、消化？可科幻文学更有“雅”和“先锋”的特质——这是就科学体系的博大精深、就科幻文学对宇宙秘密和人类终极出路的深切渴望与前瞻而言的。数年前，我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：王晋康的科幻小说提醒我们，科学因子在小说审美价值评估中一直就不该缺席。进而言之，包括王晋康在内的众多科幻作家的创作事实上已经在刷新我们对“小说”、“对文学”的认知与期待了。所以，科幻文学在未来汇入文学主流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。一切都有待时间来证明。

“虔诚的宗教信徒、激情的诗人和理性的科学信徒这三者道不同不相为伍，他们分别从东西南北坡爬山、登顶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大家都在同一峰顶会师。”这是王晋康《宇宙卵》中的一段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描述。我常想：科幻文学不正是宗教、文学与科学这三者聚合在一起时的美好产物吗？而“最强大脑”王晋康在其创作中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凝思思考、对人类命运的诚挚关怀实在值得我们细细体味、慢慢消化。

■ 第一感受

探寻那些看不见的生活与内心

——读赵志明《看不见的生活》

□ 吴佳燕

赵志明的小说至少有两套面孔，一套怪异神秘，引人侧目与遐想；一套细腻写实，让人亲近与共情。这与他的独特的写作路径有关，他一方面对历史传说、志怪传奇以及传统文化的神秘部分进行着现代演绎与“故事新编”，一方面用白描的手法洞察现实日常与人心幽微。《看不见的生活》无疑属于后者，小说中的少年小林在13岁的时候突然遭遇命运的袭击，变成了盲人，进而展开了一个中途失明者艰难而漫长的心理建设与自我拯救之路。心理学上有“十三岁现象”的说法，指孩子在13岁左右的青春成长期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别敏感、叛逆、脆弱、激烈、难以沟通的现象。《看不见的生活》中，小林遭遇的是“十三岁现象”与中途失明的双重打击，其内心的激荡与陨落难以想象。

《看不见的生活》首先是对一个中途失明者的心灵的探寻，想象这样一场巨变在个体内心掀起的波澜，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真实具体的、看不见的生活。眼睛是人的重要器官，是人向世界建立联系的必要通道。眼睛还是心灵的窗口，让人既获得“看见”外部的直观感受，又为内部的情绪情感进行输送，并为心灵提供“在场”和目击证据。可是，小林心灵的这扇窗户却被骤然关闭，而且是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。赵志明用极大的同情和细腻可感的笔触，描绘出小林丰富跌宕的心理变化过程，并运用修辞与想象把人物复杂的心理感受变得具象可视。小林的眼睛是看不见了，但是他眼睛看不到的地方，耳朵却可以成为他的世界连接器。小林的内心感受，也可以借助他人视角以及修

辞与想象变得形象、准确。恰当的修辞是语言的高光时刻，美妙的想象为叙事插上了翅膀。小说借此描绘出一个人在人生变故面前，在生存意志下不断适应调整、进行心理建设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人在时间的洗礼下内心逐渐变得沉静平和、精神得到历练和成长的过程。失明虽然掐断了小林像正常人那样去求学、工作、社交或者结婚生子的诸多可能，却给他的人生开启了另外一扇窗，让他不但可以活下去，还可以有所追求和寄托，让他模糊不清、一步步遁入黑暗的生活别有一番饱满与精彩，而且生命的境界也得到了提升。

赵志明的小说有一种洞明世事人心的沧桑与通透，小说叙事不时溢出，直接抒发与讨论一些话题，从而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和普遍意义。这从《看不见的生活》里周围人对小林失明这件事情的反应及变化就可见一斑，也与小林自我的心理感受形成互文。最初得知小林失明的消息，老师、同学和亲戚都来慰问却吃了闭门羹，又对此表示了理解。后面的一番评论犀利而透彻，认为大家的看望只是出于人情世故，他们总是比当事人更适应各种变化，其实折射出的是一种事不关己、见怪不怪的普遍心理。真正关心小林的只有他的亲生父母，然而他们除了任劳任怨地照顾与惯着小林，于他的真正成长与自立并无益处。直到父母先后去世，失去依傍的小林才借助盲人按摩与黄梅戏，在物质和精神上逐渐独立。真正给他情感慰藉的是哥哥大林的两个孩子，在他内心冲撞严重的失明初期，只有牙牙学语的小侄女“用胖嘟嘟的小手



触摸他的眼睛”才重新唤起了他内心的柔软；而与侄子林园的投合交流，更是带给他无比的安慰与寄托。然而，随着两个孩子逐渐长大、拥有各自的生活，跟小林有过情感交集的两个人也因为外在的原因一一离开，小林最终和他的视力一起获得圆满自足：“黑暗终于得以圆满”，“从此他可以如释重负，了无牵挂”，没有人发现他的改变，也没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。

赵志明的小说还蕴藏着一种深沉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感，让他那些对人情世故和人性人性的体验和看法得以落地。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“乡村的人际关系往往落脚在空间距离上”，一个人与他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影响着他的情感态度。《看不见的生活》里小林因为眼睛突然失明，犹如往平静的乡村生活里丢了一块石头，从父母到兄弟到老师、

同学、亲戚、村人，与病人关系的亲疏决定了这块石头究竟能激起多大的水花和涟漪。中篇小说《在河之洲》，写一家六口人因为在村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扩建房子，只能到村子外围的河边建房居住的故事，房子与村子的空间距离，影响着一家人与村人的关系变化。在这里，小林的眼睛和河边的房子都成为人性的试金石，测量着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心之间的距离。让人感受到变化的是空间，而真正让人适应变化的却是时间。小林终将接受和适应失去视力的、看不见的的生活，人与人、人与物、人与地方的关系，最终也都会演变成人与时间的关系。因此，所有的回溯与记录，都是为了记住我们的来处与来过，具有路标的指引意义，也是人对时间的无限反抗。

回头再看“看不见的生活”这个题目，至少有三层意思：一是直指因视力丧失，一个人的具体生活受到影响；二是泛指一种被人忽视、难以看见的生活角落，那些弱势群体和小人物的生活与内心；三是喻指生活与视力的辩证关系，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看得见与看不见，除了与视力有关，更与自身的视野、视角有关，柱状视力、信息茧房、选择性看见或屏蔽，都可能影响到他对生活的想象与态度。而赵志明之所以把“看不见的生活”作为一部小说集的书名，关注生活角落形形色色的小人物，傻子乞儿、歧路青年、邮政储蓄所的保安、乡村孤寡老头、生活逃跑家、被狗叫困扰的失眠女人、在游戏中迷失的洞中男孩，等等，正是为了审视生活、体恤人心，让那些看不见的生活与难以触及的内心被更多的人看见与关切。

■ 编辑手记

不同的文学刊物，跟不同的人一样，有着自己的性格。这种性格的形成，来自创刊时定下的方向与宗旨，来自一代又一代编辑留下的传统，也跟某一任社长、主编有很直接的关系。《天涯》也是如此，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，呈现出自己的面目与性格。《天涯》的前身为1962年海南行政区创办的《征文之页》，1972年更名《海南文艺》，1980年更为现名《天涯》……1996年，韩少功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，对《天涯》进行改版，把一个地方性质或者说带着某种内刊面貌的《天涯》，办成了跨文体类型的文学杂志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。

在1996年改版之前，《天涯》编辑部内部有过一份《天涯》杂志编辑设想，其中就鲜明地提出：“改版后的《天涯》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、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，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。”还提到：“它仍然以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为主体，同时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杂文学即大文学的传统，注重培育和保持各种边缘的、杂交的、新异的文体。它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，与此同时，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，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，作为文学外延和纵深，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。”这份“设想”中提到的“道义感”“人民性”“创造力”成为了《天涯》的办刊宗旨和内在精神气质，一直被后来的编辑所秉持；对文体边界的拓展也落实在《天涯》的专题策划和编辑实践之中。可以说，后来的《天涯》基本上完成了“设想”里的规划，并在一代又一代编辑那里得到传承与发扬。改版后的《天涯》的英文译名为“Frontiers”，既意为“边缘”，也代表“先锋”……这自然也是主持改版的寄望。



□ 林森

主持改版的社长是韩少功，主编是蒋子丹，在后来的文章中，他们都很清楚地表达过，《天涯》之所以有这样的面貌登场，既有外部的因素，也有内部的缘由。外部的是：《天涯》地处建省不久的边缘省份，根基浅、稿费低，要和很多传统名刊抢小说（基本上所有文学刊物都以中短篇小说为主），毫无竞争优势，那不如做其他刊物做不了的事。内部的是：主持改版的韩少功，本就一直在进行文体边界的探索，和《天涯》改版几乎同时进行的，是颇具文体创新的《大桥词典》的创作（《大桥词典》发表、出版于1996年，和《天涯》改版同年），韩少功在编辑、创作上，都力图突破局限、拓宽边界。在这样的外部、内部作用下，改版后1996年第一期，汇集了史铁生、叶兆允、叶舒宪、米兰·昆德拉、张承志、李皖、苏童、陈思和、南帆、格非、韩东、韩少功、蒋子丹、薛忆尧、戴锦华等名家，全明星阵容，“作家立场”“民间语文”“艺术”等呈现思想性、民间性的栏目占据大篇幅，成了《天涯》最大的亮点。这样的阵容、这样的编辑思想，并非改版后的独一期，而是延续了下来，编辑们以“把每一期都当成创刊号来办”的激情在编刊。

改版后的20多年里，在大多数文学刊物都以几个中篇小说、几个短篇小说搭配几篇散文而变得面目越来越模糊之时，《天涯》的思考性、前瞻性、策划性，一直在延续和强化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《天涯》的编辑要比很多文学刊物的编辑辛苦，这种辛苦体现在不以小说为内容主体的吃力不讨好，更体现在努力思虑现实本身所需要承受的目光。在我看来，《天涯》不仅仅是优秀作品登台亮相的平台，更有某种整体性——就是说，在编辑《天涯》的过程中，我们特别注重话题的引领、作品的搭配所营构的整体性，各栏目之间、各文章之间，互相呼应、彼此关联。以《天涯》2020年第5期（9月）为例，在编这一期时，编辑部也清楚“后疫情时代”的到来尚言之过早，可疫情所带来的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或将延续到疫情之后；因此，我们策划推出了这期“后疫情时代的生活”文学特刊，在多个栏目、以多种文体来探讨疫情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。“作家立场”栏目中，韩少功、刘大先、王威廉、洋伟江四位作家、学者，对聚集、安全性焦虑、数字社会、生存结构、偶然偏离状态等疫情期间产生的新问题，展开了深入的思考，他们的文字有温度、有问题意识，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新境况的新思路。与这些思考性文字相搭配的，是在“小说”栏目刊发了学者张柠的小说《新冠故事集》，家政工、快递小哥、图书编辑等在疫情期间的故事，被多方位呈现。在“民间语文”栏目，黛安的《疫情期间归国手记》也以饱满的细节，记下了全球化图景下无法忽视的生活剪影；新冠疫情期间之前，她去英国伦敦看望留学的女儿，之后疫情在国内和国外的陆续暴发，让其归国之路变得无比困难。理论性的思考、虚构的讲述、真实细节的记录，三者互相搭配，从各个角度呈现思考、表达时代。编辑貌似是“隐身”的，但我们的工作无所不在，要组织这么一期特刊，所有的策划、约稿、编辑工作都要提前半年以上——也就是说，在疫情开始后没多久，我们就敏锐地意识到该事件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，开始约请不同领域的作者，让他们经历阵痛的同时也保持思考和书写的状态。稿子来了，编辑同样也面临着极大压力，我们深知，在诸多情况还处于进行时不明朗状态下，所有思考都难免是一叶障目，很容易招来骂声，而让这些文章以什么方式呈现，是对编辑能力、编辑经验、编辑勇气的考验。

《天涯》关注时代、思考现实，而面对文学内部问题的时候，其同样反应迅速、不吝版面。比如说，2019年，我们感觉到中国的科幻小说正以迅猛之势来袭，于是，在当年第5期，我们就组织了一个“末世”科幻小说特刊，汇集了多位年轻的科幻小说作者的多篇科幻小说，并以前所未有的“礼遇”，把这些小说作品放置在以往最看重的“作家立场”栏目之前；该小辑发表之后，迅速被出版社汇编出书，并被翻译成外文。还比如说，2023年的第2期，我们组织了一个“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”小辑，七位青年写作者，全是我们从杂志的投稿邮箱里挖掘出来的。事实上，很多作者、读者一直怀疑，文学刊物是否还在看那些自然来稿？多年以来，挖掘新人一直是我们的目标，但各种对文学编辑和刊物的质疑从未停止，对于对这一问题的回应、更出于对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作者的推介，我们以有些“标题党”的“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”这个小辑名，希望让这些默默投稿的青年作者被更多人看到。这个小辑推出后，已有数篇小说被重要选刊转载，给了那些新出道的写作者以极大的激励。

1996年之后，在具体的编辑上，《天涯》有过不少局部调整，但其内在精神并没有过多的改变。这并非固守不化，而恰恰是坚持着我们所秉承的开放、思考的姿态，不被一时的风潮所裹挟。在多变、易变、求变、催变的氛围里，变是容易的，坚守初心反而更加困难；在不确定之中，保持确定，要更煎熬。事实上，自2008年真正回到《天涯》编辑部开始，转眼15年过去，我看到在这短暂又漫长的15年里，我们很多多次面临选择：我们是不是该放弃坚守，以跟其他刊物相似的面貌出现，为编辑部的每一个人减压？我们编辑的内心，又何尝不是时时在拒绝这样的诱惑？如果放弃了思考、放弃了策划，把刊物变成几篇小说、几篇报告文学、几则散文的随机拼凑，我们将会轻松得多；如果放弃了专业、纯粹和公义，把某些版面以高价出让，我们也会惬意得多。

但是，如果真的那样做了，如果真的放弃了对“道义感”“人民性”“创造力”的秉承，如果真的放弃了对文学边界的探索，如果真的满足于将文学变成文字游戏的安全轻松……那我们费尽心力跟一个一个词语、一个一个标点较劲的意义又何在？我们总是希望通过具体的工作，让世界变得更好。我知道，在当下，谈责任、谈担当这些带着某些理想主义的词汇，总是显得有些可笑而虚假，那就不说那么远，只这样说好了：如果一家刊物彻底放弃了个性，以嘻嘻哈哈的方式，把自身样貌和个性消融于群刊之中，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要知道：个性的丧失，也是生命的舍弃。

（作者系《天涯》主编）

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

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